

■历史·民族研究

秦汉河东郡历史地理相关问题初探

薛晓强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西安 710119)

摘要:秦汉河东郡处于京畿边缘地区,交通便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与交通大发展相反的是,河东郡的文化在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儒学不兴”的状态。本文主要从地域沿革、交通地理和文化地理三个方面对秦汉河东郡的历史地理进行一个整体的梳理和介绍。

关键词: 秦汉;河东郡;交通;文化

中图分类号: K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770X(2016)03-0101-05

PDF 获取: <http://sxxqsfxy.ijournal.cn/ch/index.aspx>

doi: 10.11995/j.issn.2095-770X.2016.03.026

A Research on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Qin and Han Hedong County

XUE Xiao-qiang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

Abstract: Qin and Han Hedong County is located on the edge of the capital city and its environs which has a very important strategic position. Compar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portation, the status of Confucianism is not so optimistic. In this paper, it will be introduced totally about Qin and Han Hedong County and mainly from geographic evolution, traffic and culture.

Key words: Qin Han; Hedong County; Traffic; Culture

秦汉河东郡处于京畿边缘地区,其政治经济地位十分重要。然而,以往学界的研究多将秦汉河东郡纳入“三河”地区或整个山西地区加以研究,又或者仅就河东郡的某个方面进行探讨,而没有一个综合性的全面的关于河东郡历史地理的文章。本文旨在对秦汉河东郡的历史地理有一个相对全面整体的认识,并主要探讨河东郡的历史沿革、交通问题和文化风习。

一、秦汉河东郡建置和管辖范围

河东郡的建置可上溯至战国时的魏国。钱林书先生认为魏国设置过河东郡,郡下辖有许多县。^{[1]23}公元前328年,秦逐步取得魏国上郡。魏国此时在河东地设郡以对抗强秦,因在黄河之东而得名。魏

国被秦击败之后河东郡又成为秦的领地,在昭襄王二十一年,司马错攻魏河内,“魏献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东赐爵,赦罪人迁之。”^{[2]212}秦始皇即位时,“北收上郡以东,有河东、太原、上党郡。”^{[2]233}可以看出,秦始皇即位之前河东就已经设郡。而汉代的河东郡又沿袭秦朝。

秦和两汉的河东郡都治安邑,今山西夏县,而且区域相对稳定,相当于今天运城、临汾两地。

(一)传统文献中关于秦汉河东郡置县情况介绍

秦代河东郡到底有多少辖县?对此众说纷纭。《中国历史地理地图集》中,关于河东郡县点注了6县(北屈、安邑、皮氏、蒲坂、左邑、平阳),却没有具体考证。^[3]《秦集史·郡县志》中利用文献考证了秦河东郡置11县(安邑、左邑、蒲坂、平阳、襄陵、垣县、杨

县、绛县、皮氏、汾阴、猗氏)。^[4]二者考证县名相同的有5个,其他的二者考证不同。

对于《秦集史》的考证,首师大后晓荣提出了质疑,他认为马非百先生在考证时所引用的明清文献在解释秦汉时期的历史地理问题时并不具有说服力,而且缺乏考古学成果的支持。他在研究战国秦汉时期文献的基础之上,参考前人成果,利用了秦金文、陶文、玺印、封泥和简牍等各种考古学成果,以及战国秦汉城市考古成果和西汉初年的简牍资料,重新考证了秦河东郡置县后,认为秦河东郡置县可考者有19县,具体包括:安邑、蒲反、汾阴、砥柱、绛县、左邑、平阳、彘县、杨县、临汾、皮氏、濩泽、猗氏、垣县、土军、蒲子、北屈、风县、新襄陵。^{[5]26-30}

关于两汉时期河东郡县设置,据《汉书·地理志》,西汉时河东郡辖二十四县。^{[6]1550}河东郡在东汉辖二十县。^{[7]30-37}此外,《汉志》河东郡之彘县,顺帝阳嘉二年更名为永安。^{[8]3397-3398}

(二)关于西汉河东郡“二十四县”和“二十八县”的问题

《汉书·尹翁归传》中有这样的记载:“河东二十八县,分为两部,阎孺部汾北,翁归部汾南。”^{[6]2402}这里明确表示了当时的河东郡有二十八个县,这就表明西汉时期河东郡的辖县情况应该发生过变动。《地理志》中详细介绍了河东郡的二十四个县,那么这个“二十四县”之说和“二十八县”之说分别是什么时候呢?

钱大昕认为“二十四县”是元始年间的辖县情况:“河东二十八县,分为两部,阎孺部汾北,翁归部汾南。今云二十四,盖元始时县数如此。”^{[9]220}周振鹤先生认为:“《汉志》各郡国所属县目乃以元延绥和之交为断。”^{[10]22}这个观点是有一定的依据的。

要确定河东“二十四县”的年代可以从河东侯国的建置入手。这二十四个县中只有“骐”是侯国,其他的二十三个县都是普通的县。而追溯这二十三个县的沿革,发现其中有的县以前也曾经封为侯国,而后来又废为普通的县,其中包括平阳县和绛县。汉哀帝元寿二年以“千户”绍封平阳侯国,汉平帝元始二年又绍封绛侯国,“千户”。骐侯国则在汉成帝元延元年绍封,“五百五十户”。稍微对比就可以了解平阳侯国和绛侯国是比骐侯国等级更高的侯国。然后我们可以按照钱大昕的思路,如果“二十四县”是元始年间的辖县情况,那么为什么《汉志》只把当时所封户数更小的骐侯国记载下来,而不将比骐侯国户数更多的平阳侯国和绛侯国也记载下来呢?这似

乎有点说不通。而我们又根据周振鹤所定的年代继续推测,如果平阳侯国和绛侯国没有被记载下来的话,那是因为它们已经降为县,而在汉成帝元延年间,骐侯国于此时设立,平阳侯国和绛侯国也降为县。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只有骐侯国被记载下来而没有平阳侯国和绛侯国,《汉书·地理志》中所记载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所以汉成帝元延年间作为“二十四县”的年代应该是基本准确的。

而“河东二十八县”出处为《汉书·尹翁归传》:“会田延年为河东太守……河东二十八县,分为两部”。基本可以确定是为汉昭帝年间(公元前86年至公元前74年)河东郡的辖县情况。张帆经过考证得出,除《汉志》所记二十四县之外,还有周阳、高梁、岸头和下摩侯国。^{[11]5}

(三)秦汉河东郡辖县情况总结

秦时期河东郡辖有19县。西汉初期在河东郡新建了一些侯国,加上恢复的战国秦时的普通县,到了汉武帝元封四年,河东郡的县级行政区至少已有二十八个。这至少二十八个县级行政区在当时也被大规模省并和取消,到了汉昭帝年间河东郡演变为二十八个县,这种辖县情况被《尹翁归传》记载下来。到汉成帝元延年间演变为二十四县(侯国),被《汉志》记载下来。到了东汉时期又撤消了四个县变成了二十县。

二、秦汉河东郡的交通

河东郡的交通在战国时韩、魏已经经营,基础良好。到了秦汉时期,不管首都在关中还是洛阳,河东郡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交通建设也一直被政府视为重中之重。

(一)陆路交通

秦汉时期河东郡主要的交通线有两条。一是经河东过上党通往今河北的道路,二是经河东往北过今太原的道路。

1. 东西走向

对于政治中心偏西的秦和西汉来说,这条道路在连接华北和关中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在秦朝时,秦始皇出巡就曾经经过这条道路。秦始皇曾经多次出巡,其第三次出巡,“二十九年,始皇东游。……登之罘,刻石。……旋,遂之琅邪,道上党入。”^{[2]249-250}马非百先生曾经考证过此路线,归途基本上是沿着东西走向的这条道路返回长安的。在《秦汉交通史稿》中,作者认为经河东过上党的这条道路是邯郸广阳道的一部分。邯郸广阳道经河东、

上党,或由河北北上至邯郸、广阳、右北平,通达燕赵。^{[12]28}

2. 南北走向

第二条道路基本上呈南北走向,可以称之为河东干线。这条河东干线基本上穿越山西全境,而山西又处于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交界地带,使得这条干线不仅具有军事价值,也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两汉时期因为北方匈奴的压力,河东地区的交通依然格外重要。对于汉朝来讲,第一,河东是北伐匈奴的必经之路之一;第二,一旦河东地区的交通主动权丢失,匈奴就可长驱直入,直逼京师。在东汉的时候这种重要性尤为突出。东汉时,自太原沿汾水谷地南下,或者由河东北上至太原以北,仍是此时河东郡的主要交通线。东汉末,郭太齐平于西河白波谷,驰骋于太原、河东之间。匈奴屡屡南下至河东、河内,威逼京师,可见交通也是相当便利的。

(二)河东郡与晋陕、晋豫交通

河东郡因为西南两面都有黄河经过,与陕、豫之间的互动必须经过黄河渡口。所以这些渡口在秦汉历史上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战争时期。

1. 晋陕交通

(1)秦河东郡与晋陕交通

秦时的晋陕交通主要凭借两个水道。其一是自汾水入于黄河,西渡今陕西韩城,东为汾阴,西为夏阳。其二由蒲坂(今永济西)渡河至临晋(今陕西大荔)。韩信攻打魏国之时,魏盛兵蒲坂,塞临晋,“信乃益为疑兵,陈船欲渡临晋,而伏兵从夏阳以罾缶度军,袭安邑。魏王豹惊,引兵迎信。信遂虏豹,定魏为河东郡。”^{[2]2613}夏阳和蒲坂便是两个主要的渡口,韩信的军队用木罾渡河,看来是熟悉秦晋水道的。

(2)两汉河东郡与晋陕交通

两汉时期晋陕交通也是凭借河东郡的渡口。汾阴县立有后土祠,从汉武帝时期开始,西汉的皇帝们曾多次顶礼膜拜于汾阴后土祠。元鼎四年(前113年)冬10月,武帝“行自夏阳,东幸汾阴。十一月甲子,立后土祠于汾阴脽上。”^{[6]183}汉时皇帝多次祭祀后土,均从夏阳东渡至汾阴。其次,蒲津亦是河东关中两地的重要渡口。在今山西永济西。秦伯伐晋,济河焚舟,即取道于此。蒲津以东岸蒲坂得名,西岸即为临晋。

2. 晋豫交通

(1)黄河渡口

两地之间的交通需要通过黄河渡口。大阳津,在今河南三门峡与山西平陆间。邓禹“进围安邑,数

月未能下。更始大将军樊参将数万人,度大阳欲攻禹。”^{[8]601}

(2)温轺道

其二是温轺道。秦始皇第三次出巡时曾经沿着这条道路。西汉时的温轺道仍然是联系河东郡河内郡的重要交通枢纽,由温轺道北可至于上党,西可通于河东。东汉时期洛阳是都城,使得河东郡的战略地位更加重要。建武初年,邓禹也是沿着温轺道进攻河东的,虽然遭遇了严密的防守,但邓禹奋力进攻,终于攻破了箕关,进入河东。箕关在王屋山南边,相当于现在的济源县西,属于温轺道的关隘。

(三)河东郡水运

河东郡西南两面都临黄河,河东郡的黄河航运在秦汉是什么样的呢?

从《禹贡》一书中可以看出先秦时河东郡的河运状况。《禹贡》是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地理学名著。《禹贡》规划出九州贡道,即各地向都城进贡的路线。各条贡道都尽量遵由水路,没有适宜的水路时才经行陆路:

冀州——夹右碣石入于河。

兖州——浮于济、漯,达于河。

青州——浮于汶,达于济。

徐州——浮于淮。泗,达于河。

扬州——浮于江海,达于淮、泗。

荆州——浮于江、沱、潜、汉,逾于路,至于南河。

豫州——浮于洛,达于河。

梁州——西倾因桓是来,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

雍州——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

史念海先生曾考证过,《禹贡》大概是在梁惠王时期撰成的^[13]。《禹贡》九州贡道皆归于河,至少可以说明作者所熟悉的黄河航道当时是畅通的。

两汉时期河东郡黄河水运又有了新的发展,因为当时河东郡是国家的重要粮仓,若要从河东郡往关中运粮,则必须要依靠汾河和黄河的水道。河东太守向皇上进言,认为沿着黄河从山东附近运粮至关中多有不便,砥柱之险对运粮困扰甚多,所以他建议引黄河和汾河之水灌溉河东的土地,便可以使该地粮食增收,便可以缓解山东运粮的压力。^{[2]1410}这一计划因为黄河改道而废弃,但是政府并未放弃通过皮氏黄汾水道对山西乃至河东郡粮食的控制。

无独有偶,宣帝年间,大司农中丞耿寿昌也认为每年从关东地区运粮至关中,对人力物力是巨大的损耗,不如“宜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郡谷足

供京师,可以省关东漕卒过半。”天子从其计,而“漕事果便”。^{[2][141]}然而除三辅外,其他诸郡粟谷运往长安,仍不能排除采取水运方式的可能,由于黄河漕运直接关系着中央政府的工作效能,甚至对于西汉王朝的生产也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而尽管“更砥柱之险,败亡甚多,而亦烦费”,汉王朝仍坚定不移地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确保漕运的畅通。

河东郡有汾水经过,汾水在秦汉时也是可以通航的。《水经注·汾水》记载了汉明帝永平年间自都虑至羊肠仓之间的水利工程,设计者规划在完工后,“将凭汾水以漕太原”。这个可以证明汾水是可以用来运粮通航的。汉武帝曾坐楼船至汾河附近的后土祠进行祭祀,也证明汾河的水量相当可观。

三、河东郡文化风习初探

(一)史籍中关于秦汉河东郡文化的记载

在史籍中对于河东郡地域风习的介绍凤毛麟角:《汉书·地理志》中“其民有先王遗教,君子深思,小人俭陋。”^{[6][1649]}《史记·货殖列传》中写道“其俗纤俭习事。”^{[2][3263]}

“有先王遗教”大概是文明发展较早的中原地区都是如此,而“纤俭习事”大概和当地的地理环境有关,这样简单地概括并不令人信服。此时的河东郡其实是一种儒学不兴的状态,民众也多崇尚武力。这和频繁战争状态以及法家思想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二)频繁战争对文化风习的影响

战国时河东郡处于秦魏两国之间,经常处于战争的状态。秦国曾夺得魏国都城安邑,强制迁出当地居民,而把罪犯流放在这里。除此之外,在惠文君八年(公元前330年),樗里子使将伐曲沃,尽出其人,取其城地入秦。当时的秦国经过商鞅变法以后,人民皆重法律好战斗。经常处于战争警备状态的河东郡的人民多多少少会崇尚武力而淡忘文化的发展,而且秦向河东地区的移民多是“罪人”或者经历过商鞅变法崇尚武力的秦人,这也会影响河东郡文化的发展。

秦汉时期尽管是大一统时期,然而分裂的危险时时存在,河东郡则夹在对立的政治势力的中间,充满着战争的危险。西汉时,北方的匈奴虽未曾南下河东,但河东已做好了战争的准备。卫青使咸宣买马河东,霍去病击匈奴过平阳,表明河东在汉匈战争中具有一定的战略地位。而且此时宗室诸侯势力强大,这些诸侯多位于关东地区,使得关东和关中的关

系经常处于紧张状态。河东郡就位于关东和关中之间,成为双方军事布防的重心。东汉时期,匈奴的势力依然强大,经常可以在文献中看到匈奴南下河东的记载。永初五年二月,“先零羌寇河东,遂至河内”。

可以说,秦汉时期的河东郡经常是处于战争时期的警备状态,来自东部或者北部的压力会影响民众正常的生活状态,对于河东郡的文化发展势必会造成干扰。

(三)秦文化对河东文化的影响

河东郡紧邻关中,从战国时期开始就深受秦文化的熏陶,河东郡的文化是三晋文化和秦文化深度结合的产物。甚至本属于山西的河东地区却不属于晋语区,而是和关中地区同属中原官话区,秦晋文化融合之深可见一斑。从考古发掘也可以窥见秦文化的影响。茧型壶是秦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在河东郡西汉早期的墓葬中却也发现了这种器物,证明了秦文化对河东郡的辐射持续到了汉代。^{[14][64-72]}

秦文化中的尚法的思想对于河东郡有很深远的影响。秦国人在战国时期有崇尚武力,民风彪悍的传统。《淮南子》记载:“秦国之俗,贪狼强力,寡义而趋利,可威可刑……故商鞅之法生焉。”^{[15][333]}商鞅变法使得秦国一跃成为强国,民众也趋向于彪悍的民风。《汉书·刑法志》里的秦国是这样的:“其生民也狭隘,其使民也酷烈。”^{[6][1086]}酷烈的民风,可见一斑。和秦国一河之隔的河东郡总在不自觉地吸收着秦文化,其中也包括这种崇尚武力的风气。西汉时期河东郡多出酷吏和法吏,《汉书·酷吏列传》中总共记录11人,河东郡就占了4人。在这种情况下,儒学也表现出了不发达的境况。有学者统计过西汉各地区所出书籍的数量,其中河东郡的数量为零。^[16]这可以看出当时社会尚法而且儒学不兴的氛围。

从秦国征战河东,向该地移民以来,秦文化就一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河东郡的文化,再加上后来战争的危急状态,造成了河东郡崇尚法家思想,儒学不兴的文化氛围。

四、结语

总的来说,河东郡地理位置非常重要,秦汉时期更是如此,就如毛汉光先生曾说:“以西汉而论,京师设在长安,有京兆、冯翊、扶风,是谓三辅;河东、河内、河南,是谓三河;又有弘农,皆司隶校尉所察。以东汉而论,京师设在洛阳,河东更为重要,七郡亦属司隶管辖。如果以全国疆域而言,中古时期的长安

地区、洛阳地区与河东地区,似乎构成一个心脏地带”。^{[17]105}

河东郡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政府需要大力发展利用其交通,以便在战争或者对地方的控制中掌握主动权,但又因为当时的内外部形势和北方匈奴对于中央政府的压力,河东郡这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尤为显现,使得河东郡经常处于战备状态,文化发展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钱林书. 战国时期魏国置郡考[J]. 历史地理.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5).

[2]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 1959.

[3] 谭其骧. 中国历史地图集[M]. 北京:地图出版社,1982.

[4] 马非百. 秦集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5] 后晓荣. 秦河东郡置县考[J]. 晋阳学刊, 2008(4).

[6] 班固.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7] 钱林书. 续汉书郡国志汇释[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

社,2006.

[8] 范晔. 后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9] 钱大昭. 汉书辨疑[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10] 周振鹤. 西汉政区地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1] 张帆. 西汉“河东二十八县”考[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

[12] 王子今. 秦汉交通史稿[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

[13] 史念海.《河山集》二集[M]. 上海:三联书店,1981.

[14] 杨哲峰. 茧形壶的类型、分布与分期试探[J]. 文物, 2000(8).

[15] 刘安. 淮南子[M]. 南京:凤凰出版社. 2009.

[16] 卢云. 汉晋文化地理[M]. 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

[17] 毛汉光. 中国中古史论[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 李兆平]

(上接第 100 页)

[参考文献]

[1]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中华书局,1956.

[2] 王怡辰. 东魏北齐的统治集团[M]. 台北:文津出版有限公司,2006.

[3] 李百药. 北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2.

[4] 黄寿成. 以高欢家族为例看东魏北齐汉化[J]暨南史学第六辑,2009.

[5] 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6] 魏收. 魏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7]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8] 周绍良,赵超.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9] 吕思勉. 吕思勉读史札记(中)[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10] 房玄龄,等. 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11] 陈寅恪. 金明馆丛稿二编[M]. 上海:三联书店,2001.

[12] 施金和. 北齐地理志[M]. 北京:中华书局,2008.

[13] 魏征,等. 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3.

[14] 谷川道雄. 隋唐帝国形成史论[M]. 李济沧,译.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15] 李延寿. 北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16] 王钦若等. 册府元龟[M]北京:中华书局,1988.

[17] 姜望来. 谣讖与北朝政治研究[M].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

[18] 苏小华. 北镇势力与北朝政治文化[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19] 王利器. 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M]. 北京:中华书局,1993.

[20] 洪迈. 容斋随笔[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21] 陈寅恪.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22] 黄永年. 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23] 陈立. 白虎通疏证(上)[M]. 北京:中华书局,1993.

[24] 郭璞注,邢昺疏. 尔雅注疏[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25] 杨伯峻. 列子集释[M]. 北京:中华书局,1979.

[26] 吕思勉. 先秦史[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27] 胡阿祥. 伟哉斯名:中国古今称谓研究[M]. 武汉:湖北交运出版社,2000.

[28] 何德章. 北魏国号与正统问题[J]. 历史研究,1992(3): 113—126.

[29] 孙星衍. 尚书今古文注疏[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责任编辑 李兆平]